

盛永华 王健编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
地以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
发展的历史。这历史永远
在阶级存在
阶级斗争不
止
斗争
范围
断发展的。
总是不断
永这不会停
水平上因
总结经验有所发现
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有所前进。停止的
论案、悲观的论案、不
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案
都是错误的。

恭贺毛主席 语祝贺
人民出版社创立三十周年

胡愈之

胡愈之画传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胡愈之画传

策划 王仿子 顾问 于 友 王仿子

盛永华 王 健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愈之画传/盛永华,王健编. -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8.9

ISBN 7-108-00951-X

I. 胡… II. ①盛… ②王… III. 胡愈之-生平事迹-摄
影集 IV. K825.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1165 号

责任编辑 曾 蕾
封面设计 董学军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9.25
字 数	80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42.00 元

目 录

中华民族的脊梁——胡愈之(代序)夏衍 3

胡愈之生平 8

画传

1896 ~ 1914 11

1914 ~ 1928 15

1928 ~ 1940 25

1940 ~ 1949 45

1949 ~ 1966 61

1966 ~ 1976 95

1976 ~ 1986 103

胡愈之生平大事记于友 胡序文 137

后记 147

中华民族的脊梁

——胡愈之（代序）

夏 衍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论及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和热情、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中国历史上也经历过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这就是7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革命，和接着而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这个伟大的时代需要巨人——这个时代也的确产生了一批思想、学识、才艺上卓绝的巨人，——在知识界，胡愈之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应运而生的巨人。

1927年四·一二事件之后，我从日本回到上海，经杨贤江同志的介绍，我认识了愈之同志，初次见面，谈得不多，不久他就逃亡到法国去了。这一年我刚入党，年少气盛，一次和贤江同志闲谈，认为愈之是《东方杂志》主编，在危难时刻他不该离开这个岗位。贤江同志沉思了一下，然后从书架上找出一份同年4月14日的《商报》，低声说：“你看看这篇抗议信，这是四·一二那一天晚上愈之起草的。”这是一篇掷地有金石声的檄文：“上海市民方自庆幸得从奉鲁土匪军队下解放，不图昨日闸北，竟演空前之屠杀惨剧。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伤毙至百余人，‘三·一八’惨案之段祺瑞无此横暴，五卅惨案之英国剑手

手无此凶残，而我神圣之革命军人，乃竟忍心出之。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万难苟安缄默。”这封抗议信是写给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的，签名者七人：郑振铎、胡愈之、章锡琛、冯次行、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当时，宝山路上的血迹未干，正是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刻，公开发表这样一封抗议信来揭露蒋介石屠杀革命者的罪行，的确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的，也由于刽子手陈群查明了这封抗议信是愈之起草的而要加以暗害，他才听从了郑振铎的劝告，离开了上海。这件事距今已经60多年了，当时愈之还没有入党。记得抗战初期周恩来同志曾和我说过：“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四·一二事件之后有两件事我一直不会忘记，一是胡愈之、郑振铎他们写的抗议信，二是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愈之同志在法国三年，在巴黎大学法学院学习国际法，研究国际问题，参加了法国的工人进步运动。我还听说过，巴金在上海《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也是经过愈之介绍的。1930年他经过德国、波兰到了苏联，1931年2月回到上海，正碰上柔石、胡也频等五烈士遇难之后不久，一方面白色恐怖严重，另一方面又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全盛时期，愈之巧妙地运用他的社会关系，在国民党办的《社会与教育》杂志

上发表了《莫斯科印象记》。这本书哄动了知识界，一年之内重印了五版，鲁迅先生写过：“这一年内，也遇到了两部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一就是《苏联见闻录》。”

“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大约是10月下旬，我在内山书店遇到夏丏尊先生，他约我到开明书店去吃饭，这是相隔4年之后再次和愈之见面，同席的都是开明书店同人，有叶圣陶、章锡琛、吴觉农、徐调孚、宋云彬等，当时愈之已经是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了。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把东三省拱手送给了日本，而西欧和美国还处在经济大萧条之中，席间谈到国事，难免会流露出一些悲观情绪，而愈之却非常敏锐地指出罗斯福的“新政”已初见成效，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必然会日益加剧，所以当前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是团结人民，反对国民党的反共反苏政策。他不断地抽烟，低声细语地说，日本侵略东北，最终的目的在于进攻苏联，所以我们应该和苏联复交，争取苏联的援助。早在半个世纪之前他就预见到东西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他的远见卓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淞沪战争之后，我和愈之有了更多见面的机会，有时在吴觉农家里，有时在开明书店。我参加了电影工作之后，有一次我和他谈起明星

电影公司的老板张石川和周剑云约我和钱杏邨、郑伯奇写剧本的事，他很有兴趣地问我：他们知不知道你们的政治背景。我坦然地说：正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左联的人，所以才要我们帮他们出主意，写剧本的。他忽然高兴起来，对我说，你们做得对，这就说明不当权的资本家也可以在爱国抗日的前提下合作的，当然他们的进步是有限度的。平时喜怒不形于色的愈之为什么对这件事感到兴趣和高兴呢，因为这件事正好证明了他早已预见到的一种即将到来的新的形势，这就是：当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国难当头的时刻，不仅小资产阶级，连民族资产阶级也可以争取到反日反蒋这方面来的事实。“九·一八”、“一·二八”之后，人民群众普遍地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而王明左倾主义者，却看不到这一形势，还在提“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和“武装保卫苏联”这一类不切实际的口号——也就在这个时期，“左联”发动了一场反对第三种人的论争。因此愈之在《东方杂志》和《生活》周刊上发表的主张争取广大群众，联合抗日的文章，也被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刊上对他进行点名批评——1931年10月的《红旗月报》第23期《满洲事变中各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政府》一文中，居然把愈之看作是第三党改组派的人物。值得钦佩的是愈之

并没有被错误的批评吓倒，他还是不断地发表文章，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中，民族资本家开始对国民党不满，国民党内部也有“不愿做奴隶的人”，蔡廷锴、蒋光鼐的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抗战，就证明了这一论点，而这一场淞沪战争又得到了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的支持，这一切也就说明了当政的国民党也不是铁板一块。我还记得他不止一次发表文章，认为美国经济复苏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决不会甘心让日本独吞中国，所以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矛盾也将逐渐显露。在三十年代初期王明路线占上风时期，在进步文化界能有这种实事求是的远见卓识，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营救被国民党逮捕和迫害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协助邹韬奋办《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通过张志让先生认识了国民党中的“亲苏派”孙科，接着担任了法国在远东唯一的通讯社“哈瓦斯社”的中文编辑主任，结识了当时在上海的许多国际知名人士，如路易·艾黎、史沫特莱、伊罗生等。这样，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发挥他不知疲倦的精力和如椽的笔力，写出了大量有独到见解的文章，也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和旺盛的工作能力，1933年秋，中

国共产党吸收他为特别党员。

从1933年到1935年2月，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连续遭到三次大破坏，损失重大。过去常说，王明左倾路线使红军损失了90%，地下党损失了100%，事实上，单说上海，尽管中央上海局和江苏省委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党组织并没有全被消灭。工会（马纯古等）、青年团（陈国栋等）、文委（周扬等）也还在人自为战，继续工作，特别是和地下党有关系的外围组织，却正利用了民族矛盾上升的机会，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反蒋运动。在这严峻时刻，我们这些身历其境的人永远也不能忘记愈之同志所作出的难以估计的巨大的贡献。愈之晚年写的《我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话：“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的一些党员，已都处于人自为战的状态，工作十分困难。这一年里，我除继续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外，还努力多方联络有志反蒋抗日的人士，力图在文化界首先能酝酿组织起一个抗日救亡的团体，以使在万马齐喑的形势下，救亡运动能有新的兴起。同时，我也以极大的热情来发展生活书店的业务，以扩大这一块宣传抗日救国的文化阵地。继1933年创刊的《文学》杂志后，在1934年9月，又创办了《世界知识》、《太白》、《译文》等刊物，1935年还创刊了《妇女生活》。这些刊物大都是我联系筹划下办起来的。”这是近代革命史、文化史上的一项

影响深远的贡献。这个时期在上海新建了三家进步书店,即“读书生活”、“新知”和生活书店,前两家是地下党人徐雪寒、黄洛峰办的,生活书店则是邹韬奋在愈之同志的支持和筹划下办起来的,这几家书店出了许多深受读者欢迎的刊物,出版了许多进步书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都是这个时期由这几家书店冒着风险出版的。在这一段时期内,他不止一次和我谈过,现在形势变了,要联合抗日,单凭热情和勇气是不够的,出书和办杂志,首先要考虑到读者的需要和他们的接受水平,“一定要心平气和地说理,切不可居高临下地训人”,当他筹备出版《世界知识》的时候,他单独约我谈话,他说:“希特勒的纳粹党在德国登台之后,国际形势瞬息万变,现在急需要有一本专门介绍和评论国际知识的杂志,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当前的形势。他要我在创刊号上写文章,我就用韦或的笔名,写了一篇论美国电影的文章。叶圣陶先生说过愈之同志的四个长处,一是他的自学精神,二是他的组织能力,三是他的博爱精神,四是他的友爱情谊。这是对愈之立身行事的最真切的评价,圣陶先生说:“愈之兄创建过许多团体,计划过许多杂志和书刊,他能鼓动朋友们跟他一起干,他善于发现朋友们的长处,并且使朋友们发挥各自的长处,等到团体

和杂志书刊初具规模,他往往让朋友们继续干下去,自己又开始新的建设。他有这样非凡的组织能力,所以建树事业之多,能比得上他的似乎少见”。不仅生活书店和它刊行的许多杂志是他“联系筹划下办起来的”,更应该说,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的救国会,抗战初期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青年记者协会,国际新闻社以及文化供应社,《南侨日报》等等,也无一例外地都是他精心策划,组织起来的。当然,我们更不能忘记,1937年冬,京沪沦陷之后,他奋不顾身地留在上海,组织人力物力,迅速翻译出版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接着又奔走呼号,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支持,出版了卷帙浩繁的《鲁迅全集》。这种大无畏的勇气和非凡的组织能力,以及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精神,在近代知识分子中,真可以说是无可伦比的。

1934年,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愈之同志就是这样一位巨人,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胡愈之

胡愈之生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代主
席胡愈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1986年1月16日十一时十五分
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胡愈之
同志1933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
党，五十多年来为党和人民的事
业，鞠躬尽瘁，奋斗不息，是一位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逝世
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损
失。全国人民为失去这样一位德
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和著名的政
治活动家而感到万分悲痛。

胡愈之同志1896年9月9
日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1911年
后，他入绍兴府中学堂，受到鲁迅
先生的熏陶。1914年，他考入上
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当练习生，
刻苦自学。他接受了新文化思潮
的影响，1919年在上海参加了声
援“五四”运动的斗争，并在《东
方杂志》连续撰文，提倡科学和民
主。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创建了
上海世界语学会，介绍俄国和其
他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1920年
他和郑振铎、沈雁冰共同发起成
立“文学研究会”，积极推进新文
学运动。1925年，他积极投入上
海“五卅”运动的游行、集会和罢
工活动，编辑出版《公理日报》，成
为指导运动的舆论工具。他还撰
写《五卅事件纪实》，忠实报道了
这一历史性的群众革命斗争。

1927年，他于“四·一二”反革命
政变的次日，激于对反动派血腥
屠杀革命群众的义愤，起草了对
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信，邀集郑振
铎等共同签名，发表在《商报》
上。在实际斗争中，他的思想、立
场日益转变，倾向中国共产党和
劳动人民。迫于国内的白色恐怖，
他于1928年1月流亡法国，入法
国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并
系统地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思
想开始由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
义。1931年初，他在回国途中，以
世界语学者的身份到莫斯科，进
行了七天的访问，写下名著《莫
斯科印象记》。这是我国第一本比
较系统地介绍社会主义苏联政治、
经济和人民生活状况的著作，反
映了他对新的社会制度的向往，
在广大青年中激起强烈的反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主
编《东方杂志》，利用这个阵地，积
极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同时他与
邹韬奋共同主持著名的《生活》周
刊，并推动创办生活书店。1933
年初，他应鲁迅之邀加入“民权保
障同盟”，并当选为总会临时中央
执行会执行委员，努力把国民党
当局迫害革命同志和进步人士的
情况向国外揭露、报道，争取国外
进步人士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声
援。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

胡愈之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在生
活书店先后筹划创办了《文学》、
《太白》、《译文》、《妇女生活》等
多种进步刊物，并亲自主编《世界
知识》。这些刊物在国民党实行文
化“围剿”的情况下，成为进步文化
工作者进行战斗的重要阵地，推
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同时，
他还推动生活书店出版了大量介
绍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籍，影响
了一批青年投向革命。在《生活
周刊》遭受国民党当局查封后，他又
积极推动杜重远创办《新生周
刊》，并且通过杜重远做争取东北
军上层人士团结抗日的工作，对
以后发生的西安事变起了一定的
作用。

1935年，上海各界抗日救亡
活动风起云涌。胡愈之同志受党
的指示把主要精力投入组织救国
会的活动。由于国民党特务的追
捕，他于1935年12月逃亡到香
港，1936年受党组织的派遣，经法
国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中国代表
团汇报情况，1936年4月返回香
港，支持邹韬奋创办《生活日报》，
不久又回上海从事支持救国会的
活动。1936年11月22日深夜，救
国会“七君子”被捕，他担负声援
营救“七君子”的组织工作，一方
面组织律师为“七君子”辩护，另
一方面通过舆论工具对国民党反
动派进行揭露和抗议。他采写的

《爱国无罪听审记》，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当局迫害抗日爱国志士的反动行径。他和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发动了“救国入狱”运动，陪同宋庆龄等知名人士亲赴苏州自请入狱，以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愈之同志以聚餐会的形式，联系和团结了在上海的一大批爱国人士，推动他们在抗日救亡中发挥作用。他倡议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把上海文化界、新闻界进步人士团结起来，向海外宣传我国抗战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战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他还出版《团结》、《上海人报》、《集纳》、《译报》等报刊，并深入去，对难民、市民和工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他在极端的困难条件下，以极短的时间，组织翻译出版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并首次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上海沦陷，他到武汉，于1938年5月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处长，主管抗日宣传动员工作，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辛勤地工作。武汉沦陷后，他受周恩来同志指派，到桂林从事统一战线工作，通过继续出版《国民公论》，组织“国际新闻社”、“文化供应社”，创办“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等

多种活动形式，使桂林很快成了大后方的抗日文化中心。皖南事变前夕，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迫害，他于1940年7月撤离桂林到达香港。接着，他按照周恩来同志指示，赴新加坡开辟海外宣传阵地，团结广大海外侨胞共同抗敌，并帮助陈嘉庚先生办《南洋商报》。他还组织了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到群众中进行抗敌宣传工作。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马来亚，新加坡危在旦夕，他在和郁达夫、沈兹九、王纪元、张楚琨等人到苏门答腊避难期间，写了《少年航空兵》一书，憧憬社会主义新中国。同时，他进行印尼语研究，编写了《汉译印度尼西亚语辞典》、《印度尼西亚语语法研究》等著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愈之同志回到新加坡，创办了“新南洋出版社”、《南侨日报》、《风下》周刊和《新妇女》杂志，在海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侨胞共同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贡献力量。1948年8月，他经香港到达华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在解放前漫长的岁月里，他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同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是我国进步文化出版事业的先驱者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同志

历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出版总署署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等职。他为我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的出版机构，出版大量的革命书刊和知识性读物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他多次率团出国访问和接待国外友人来访，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发展民间外交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他极力在我国提倡学习世界语，为推动世界语在我国的发展，增进中外世界语学者的友好交往费尽了心力。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长期主持民盟的实际工作，忠实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善于和党外同志合作，团结广大民盟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民盟的进步和发展，开创民盟工作的新局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受到了民盟广大盟员的尊敬和爱戴。三十多年来，他为发展我国的新闻出版、文字改革和人民外交事业，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

一战线不辞劳苦，兢兢业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十年浩劫中，胡愈之同志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拨乱反正以来，他虽然年事已高，仍然不遗余力地工作和学习。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拥护改革和对外开放等各项重大决策，努力学习马克思

主义理论，关心国内外大事，敢于提出利国利民，清除弊政的建议。近几年来，他特别注意扶持年轻的同志承担第一线的工作，言传身教，希望他们接好革命事业的班。在病重期间他仍然关心着民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胡愈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战斗、全心全意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他对党忠心耿耿，坚信党的事业必定胜

利，忠诚地接受党的领导和执行党所交给的各项任务。他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他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廉洁奉公，作风正派。他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知识分子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好榜样。他的历史功绩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

(选自 1986 年 1 月 23 日《人民日报》)

1896 — 1914

1896年9月9日，胡愈之出生在浙江省上虞县丰惠镇。上虞县地处浙东地区，西邻绍兴，东接宁波，交通方便，经济文化历来比较发达。宁波作为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口岸，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和冲突的门户，民族民主革

命思想随之发生、发展，孕育了大批以拯救和发展祖国为己任的革命者和先进人物。秋瑾、徐锡麟、鲁迅、经亨颐、蔡元培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胡愈之自幼在浙东绍兴地区接受教育，逐渐成长。

浙江省上虞县丰惠镇胡愈之旧居





浙江省上虞县丰惠镇胡愈之旧居

胡愈之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胡纯耀是位翰林，曾任清朝的御史。父亲胡庆皆虽是秀才，但在清末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成为上虞县的维新派首领，在县里捐资推行新式教育和慈善事业，创办了新式学校“巽水学堂”和县里第一所女子学校“巽水女子学堂”，又创办孤老院、孤儿院，并常向穷人赈济布施，热心为大众服务。他去世时，家资耗尽，负债累累。他对胡愈之的成长有重要影响。



胡愈之的父亲

“我现在能够写一些废话，甚至于懂得一些办报纸刊物的事，还要感谢我的父亲……至今对于我的品格和趣味影响最深最大的，依然是我的平凡的父亲。我的父亲做到了极平凡的伟大。我极渺小，我没有做到我父亲的伟大，但我学到了我的父亲的平凡。”

——胡愈之：《我的父亲》

（载 1946 年 11 月 22 日

《南侨日报》）



胡愈之的母亲



胡愈之幼年就读的上虞县立高等小学堂
(现为丰惠镇中心小学)。



胡愈之曾就读的绍兴府中学堂（现为绍兴市第一中学）。

1902年，胡愈之入私塾，不久改入新学堂——县立高等小学。除了学习四书五经、《古文辞类纂》之外，还学习历史、地理、外语、代数、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眼界为之大开。1910年，十四岁的胡愈之以优异成绩从高等小学堂毕业。

1911年初，胡愈之在父亲的支持下，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绍兴府中学堂“实科”（理工科）二年级。此时，鲁迅正在绍兴府中学堂担任学监并兼授生理卫生课。胡愈之在这里不仅学习到许多新的科学知识，而且进一步受

到民主思想的熏陶。

1911年9月，胡愈之因患伤寒从绍兴府中学堂辍学。1912年进入杭州英文专科学校攻读，半年后学校停办。胡愈之在父亲的安排下，师从绍兴名宿薛朗轩学习古文，同时自学英语及世界语。此期间，他经常阅读父亲所订各种传播新思想的报刊，思想逐步开阔并培养了对编辑工作的爱好。他曾与几位弟弟一起编辑了手抄的《家庭三日报》、《家庭杂志》、《后园周报》等报刊。这项工作坚持了三四年，共出版了四五十册之多。